

二十一世紀聖經研究獻議—— 本土化的回應

盧龍光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夏理士教授的文章，資料非常豐富，反映夏教授學識廣博；尤其他雖然是新約學者，但對舊約竟然也有廣泛的涉獵，實在難得。從他的文章看來，夏教授明顯是一位歷史鑑別學 (Historical Criticism) 的忠心支持者，加上受傳統的聖經研究訓練，他對聖經學者的希臘文語文及文法水平的期望也很高。然而，夏教授對自己的局限也直言不諱，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白種操英語的男性更正教徒」，這種自我反省的意識，實在難得，是我們在討論二十一世紀聖經研究議程時，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可能正因為夏教授本身的限制，使他的文章缺乏前瞻性。他雖然強調新世紀其中的一個挑戰，是在尊重傳統與回應現代之間作出巧妙的平衡，但他卻似乎偏重於「傳統」及「過往」。在討論下一個世紀的聖經研究議程，若仍然只重視歷史文法鑑別學 (Historical-grammatical Criticism) 作為主要的研經方法，可能忽視了聖經研究法過去二十多年的

多元化發展。¹從發展本土化聖經研究的角度來看，著重歷史文法鑑別學，假設了我們必須對聖經文本內容及傳遞過程的歷史有廣泛和深入的了解，對聖經原文有高水準的掌握才能恰當地理解聖經。這些條件，對我們這些「非西方」的聖經研究者而言，實在是先天不足，盡了很大的努力也是事倍功半。當然，對歷史及原文的認識有一定重要性，但歷史文法鑑別學本身卻有其局限性，因為經文的歷史處境根本無法準確地被重塑，對文法的了解也可以在細微的地方有很大的爭論；²在二十一世紀的聖經研究議程上，它還有甚麼開創性的發展，實在令人懷疑。但近二十年所發展的社會科學鑑別學 (Social-scientific Criticism) 及新文學鑑別學 (New Literary Criticism)，³對於補充歷史文法鑑別學的不足及避免重蹈其不足之處卻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對我們這些難以用原始資料來研究聖經歷史處境及充分掌握希伯來——希臘——羅馬語文的非西方人士而言，這些以社會科學方法及以經文為本的研經法，相對地會較易掌握。這些新的方法，因先天性限制較少，對我們研究聖經及應用其信息在我們本土的處境中會更有幫助。

另一方面，夏教授對新發展的聖經研究進路給予頗負面的評價，如：受眾回應研究法 (Reader-Response Approach)、⁴ 婦女釋經 (Feminist

¹ 參 W.W. Klein, C.L. Blomberg, and R.L. Hubbard,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Dallas: Word, 1993), 427-57。

² 參 F. Hahn, "Problems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i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New Testament Faith*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3), 13-33 ; P. Stuhlmacher,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trans. R. A. Harrisville (London: SPCK, 1979); R.F. Collins,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1983), 64-69。

³ 除參注釋 1 之書籍外，更深入詳細介紹此兩種鑑別學之書籍，有：B. Holmberg, *Sociol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 An Appraisal*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J.H. Elliott, *What is Social-Scientific Criticism*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 及 T. Longman III, *Literary Approaches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Leicester: Apollos, 1987); E.V. McKnight, & E.S. Malbon, eds., *The New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New Testament*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4) ; 另亦有將此兩種鑑別學作整合發展成另一鑑別學，見 V.K. Robbins, 1996 *The Tapestry of Early Christian Discourse: Rhetoric, Society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⁴ 參 M. Davies,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in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s. R.J. Coggins & J.L. Houlden (London: SCM), 578-80。

Interpretation)⁵ 及後殖民釋經 (Postcolonial Interpretation) 等,⁶ 他認為這些研經進路只屬短暫的潮流而沒有甚麼發展前景。但必須注意, 受眾回應研究法著重經文裡作者與受眾的互動性; 婦女釋經提醒我們在經文中往往忽視了婦女的經驗、地位與角度; 後殖民主義釋經更提醒我們作為釋經者 (interpreter), 必須意識自己及受眾所受的殖民主義歷史、文化、政治等影響, 以致在釋經過程中, 聖經信息可發揮更新文化的力量。這些新的研經進路不但補充了歷史文法鑑別學的不足, 更開創了新的關注, 這對我們華人聖經研究者非常重要, 因為聖經對我們而言, 最需要關注的課題之一, 就是我們這些沒有西方文化 (基督教文化) 傳統的華人受眾, 如何與聖經信息產生互動的關係。注意釋經者與受眾的處境及特點, 並從受眾的角度來理解經文, 正是我們從事聖經研究本土化的一個重要角度。

婦女釋經的重要性, 在今日華人教會已逐漸受到重視, 不單因為華人教會中, 婦女佔了較大的比例, 更因中國文化對婦女的貶抑, 實在需要更新, 婦女釋經可幫助女性基督徒對聖經有更切身的了解, 並可提高華人社會對婦女之貢獻的重視。另一方面, 婦女釋經帶來更具想象力的研經進路, 使著重本土化研經的學者, 能從批判文化傳統的角度去開啟經文的意義。

後殖民釋經對亞洲聖經研究者更具開創性, 因為多個亞洲國家及地區, 如印度、菲律賓、印尼、韓國、台灣及香港等, 皆有頗長的殖民統治歷史, 即使中國大陸亦深受殖民主義所影響。殖民地思想仍然深入人心, 這些社群仍在非殖民化的過程之中, 後殖民釋經正是幫助我們面對殖民歷史及意識形態的釋經法。它對於將聖經信息應用於本土的努力, 可以有所啟發。

⁵ 參 D.F. Middleton, (1990)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in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231-34 及 L.M. Russel, 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E.S. Fiorenza, *But She Said: Feminist Practice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Boston: Beacon, 1992)。

⁶ 參 M. Prior, *The Bible and Colonialism: A Moral Critique* (Sheffield: JSOT, 1992); L.E. Donaldson, *Postcolonialism and Scriptural Reading* (Atlanta: Scholars, 1998)。

以上提及的社會科學鑑別學、新文學鑑別學、受眾回應研經法、婦女釋經及後殖民釋經等，都是結合了現代學科、歷史、社會、及文化處境的發展而產生的聖經研究法，這個發展方向相信在二十一世紀仍有不少的進展，對我們關注本土化聖經研究的人士來說，更是值得學習及使用。另一方面，傳統的歷史文法鑑別學的首要關注是經文的「原初」意思，或是原作者的「原意」；就研經的步驟而言，這關注是重要的，但卻無法確定其結論。對我們今天的讀者而言，尋找這些經文在「此時此地」的處境中有何意義，是更重要的工作，⁷而這也正是本土化聖經研究的關懷所在。

在總結部分，夏教授特別提到未來聖經研究需要發展的方向之一，是尋找新舊約及全本聖經的「中心思想」，這一向是不少西方聖經學者關注的工作，但也可以說是沒有肯定結論的工作。因為新舊約全書六十六卷書的作者及內容，在歷史、文化等處境上的差異非常鉅大，除非以一個很寬鬆的籠統概念，如：「約」或「福音」、「拯救」等作中心思想，否則任何具體或狹窄的「中心思想」都難以獲得共識；強調統一的「中心思想」，只會阻礙我們認識聖經的多元化思想。對本土化聖經研究的發展來說，這並不是我們的重點；因為本土化的著重點正是對「特殊性」、「處境性」的關注，多元化思想的差異並不需要調和。西方的聖經及神學研究差不多壟斷了整個世界的討論議程，所謂尋找聖經的統一「中心思想」，乃是西方聖經學者在其歷史、文化、語文、社會、政治、經濟的傳統與處境局限下所確認的「中心思想」。若我們以他們所強調的「中心思想」作為量度「正統」或甚至「真理」的標準，則非常危險，這將會阻礙聖經的信仰在多樣化處境中生長茁壯的機會。從本土化角度來看聖經研究的未來發展，我們不需要害怕尋找聖經中的「特殊性」，也不害怕以我們處境中的特殊性，如：中國人的祭祖在文化及宗教上的特殊意義，作為研究聖經信息的優先關注，這可能正是打破目前被西方壟斷的聖經及神學研究議程中的一個發展方向。這個好像矯枉過

⁷ 參 K. Stendahl, "Biblical Theology, Contemporary," in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Vol. 1 (Nashville: Abingdon, 1962), 418-32, esp. 419-20; A.C. Thiselton, *The Two Horizons* (Exeter: Paternoster, 1980) 及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2)。

正的建議，提醒我們若意識到自己的局限——「中國香港特區的華人更正教徒」的身分，便可以使聖經研究的成果對非西方文化處境的人作出貢獻，並且平衡了西方聖經研究的局限，相信這方面的發展也是夏教授所樂見的。

夏教授在文章中分享了他曾於1982年草擬創立「國際福音派神學家團契」的計劃書，可惜未能實現。但這建議對我們華人聖經研究學者有實際的意義，因為聖經研究從來都不是一些個人的活動，必須是群體的努力，對於目前仍然人數不算多的華人聖經學者而言，凝聚集體力量，推進本土化聖經研究工作實在迫切，盼望夏教授的構思能促使我們成立「華人聖經學者本土化研究團契」，⁸為二十一世紀本土化聖經研究而努力。

⁸ 1992年，多位八十年代在西方大學攻讀新約博士學位的華人學者曾定期在灣仔循道衛理會香港堂舉行聚會及研討，1994年開始包括舊約學者，可惜1995年後因種種原因而停止。1999年1月崇基神學組舉辦的「傳經講座」，邀請了十七位華人學者負責，在某一意義上是繼承了這段歷史，但要進一步將這些在不同神學院及大學的聖經學者凝聚及組織起來，仍然需要更大的努力。